

——译家之言——

译境

王佐良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译家之言——

译境

王佐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境 / 王佐良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7
(译家之言)

ISBN 978-7-5135-7810-3

I. ①译… II. ①王… III. ①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3125号

出版人	蔡剑峰
系列策划	吴浩 易璐
责任编辑	赵雅茹
装帧设计	李双双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7810-3
定 价	29.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 278100001

目录

- 1 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次专题翻译讨论会上的发言
- 7 词义、文体、翻译
- 21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
- 32 翻译与文化繁荣
- 45 严复的用心
- 53 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
- 58 我为什么要译诗——一本译诗集的自序
- 61 谈诗人译诗
- 66 译诗与写诗之间——读《戴望舒译诗集》
- 85 穆旦的由来与归宿
- 97 一个莎剧翻译家的历程
- 114 以诗译诗，甘苦自知——评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论痕》
- 124 译彭斯的再思
- 131 一首哲理诗及其翻译

- 146 汉语译者与美国诗风
161 另一面镜子：英美人怎样译外国诗
175 Translation Standard in China: a Survey

附录

- 195 答客问：关于文学翻译
204 诗评与译诗——与王佐良教授一席谈
208 “土耳其挂毯的反面”

新时期的翻译观

一次专题翻译讨论会上的发言

1. 中国翻译家是否有一个独特的传统?

有的。根据古代译佛经和近代译社科和文艺书的情况来看,这个传统至少有三个特点:

一是有高度使命感,为了国家民族的需要不辞辛苦地去找重要的书来译。

二是不畏难,不怕译难书、大书、成套书。

三是做过各种试验:直译,意译,音译,听人口译而下笔直书,等等。

因此成绩斐然,丰富了中国文化,推进了社会改革,引进了新的文学样式。

单从现代看,也有一些特点可说。

例如,若干第一流作家都搞过翻译: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田汉、曹禺、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李健吾等等都是。在许多情况下,翻译提高了他们的创作,或者发展了他们的创作。而由于他们也从事翻译,翻译的地位也提高了,出版社比较重视,译者在社会上也取得一定名望。西方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近代史上,那里似乎没有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如中国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社会上不甚注意翻译。译者多数谈不上社

会地位，版权页上的译者名字往往印得很小（或根本不印），所得报酬十分微薄，一般人也不关心译者是谁。

就选择什么书来翻译而论，中国当然也有为了赚钱而滥译抢译的人，但多数译者是慎重的，虚心的——中国译者似乎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认真地对待“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努力发掘东西方各种优秀作品，而西方的译者则不免仍受“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对于还未形成时尚的小国远地的文学是不大注意的。影响及于读书界，于是三四流的西方作品在中国也有人知，而第一流的中国作品就在英美的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之间也寂无反响。这当中有其他原因，但西方不够重视翻译以及译品选择上的偏颇也是因素之一。

2. 对于翻译理论，有什么新想法？

未必真是什么“新想法”，姑且写下来就正于行家。

严复的历史功绩不可没。“信、达、雅”是很好的经验总结，说法精炼之至，所以能持久地吸引人。

但时至今日，仍然津津于这三字，则只能说明我们后人的停顿不前。三字也不能等量齐观：“雅”的提法显然问题较多。

不妨看看别的有经验的译者又怎么说。

余冠英先生译《诗经》为白话，体会到五点：

- 一、以诗译诗；
- 二、以歌谣译歌谣，风格一致；
- 三、不硬译；
- 四、上口、顺耳；
- 五、词汇、句法依口语。

何等切实！何等新鲜！

我们也想本着切实的精神，建议两点：

一、辩证地看——尽可能地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

二、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

3. 文体问题

似乎可以按照不同文体，定不同译法。例如信息类译意，文艺类译文，通知、广告类译体，等等。所谓意，是指内容、事实、数据等等，须力求准确，表达法要符合当代国际习惯。所谓文，是指作家个人的感情色彩、文学手法、结构形式等等，须力求保持原貌，因此常须直译。所谓体，是指格式、方式、措词等等，须力求符合该体在该语中的惯例，决不能“以我为主”，把商品广告译成火气甚重的政治宣传品，等等。

当然，体中还有体，不能同样对待。如文艺中小说与诗歌，显然译法要有不同。

4. 为读者着想

过去的翻译原则似乎都是提给译者遵守的，何妨换个角度，看看读者关心的又是什么。

也许有两点是读者都会要求于译文的，即它应该可靠，可读。

所谓可靠，是指译文忠实于原作，没有歪曲、遗漏。

所谓可读，是指译文流利，亦即余冠英先生所说的“上口、顺耳”，即使是直译也要使人大体读得下去。

5. 理解原作

十分不易，需要语言修养，文化修养，各方面的知识。在这里，译者要虚心再虚心，要不辞辛苦，勤查多问。首先，要把本文从头到尾多读几遍。同时，也无须自馁。人连密码也能破译，又何在乎一篇文一本书？

6. 运用语言

要经常练笔，要从实事小事做起，如想办法把一个动作的程序、一个事件的原因和结果、一个主张的根据和主要论点等等叙述清楚，有头有尾，步骤分明，而又要言不烦，文字干净。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是基本功。学外语也首先要做到这一点。

目前对于什么是好文章，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追求字面的美，因此或读古书，从中发掘词藻和成语；或看外国新刊，从中寻找新说法和时髦名词。如果确有必要，两者都可用；仅作装饰，哪样也坏事。往往是白文最顶事，也最美。美不在文词，而在文词后面的思想。要语言锐利、新鲜，首先要头脑锐利、新鲜。

从译者说，还要深刻地体会原作者的思想感情，直至其最细微、最曲折处。

有了好的汉语修养，才足以胜任翻译外国书；但通过翻译外国书，也可以提高汉语的表达力。例证之一：通过翻译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书，汉语的逻辑性和精确性都提高了。

7. 新的研究课题

已有的翻译研究大体可分三类：理论探讨，译文品评，翻译史研究。

每类都还有许多事可做，都有待深入与提高。

想到的一些具体课题：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他译了多少书？根据什么原本译的？译文的得失？翻译主张的由来（有什么时代背景？政治因素？文化界情况？等等）？是否真的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中途有无变化、修正？对翻译界的影响？与其本人创作的关系？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起了什么作用？……今天的评价？

也可用同样的问题来研究任何别位作家兼翻译家。

断代翻译史——现在已有了几本简史、通史，似乎可以集中研究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了，如唐朝译佛经的最盛时。这类研究要多找一些资料，要有较长的成片成段的例证，要突出若干重要译者，替他们摄特写镜头；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有历史家、思想家、佛学家的合作；总之要比已有的叙述做得更丰满更深刻。

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之间的互译研究——也许我国最大的翻译工作量在此。有多年丰富经验可以总结，也有许多学术问题（语言的、文化的、历史的等等）可以研究。这也是翻译比较研究的一个广阔园地，需要由各族学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内通晓多种语文的博学鸿儒来共同进行。

口译研究——口译本身就有许多题目需要探讨（中译外，外译中，有准备的与即席的，隔段译与同声译，一般题目与专门题目，人员如何训练；师资如何培养、提高，设备如何添置、利用，等等），而由于口译的兴起又带来了关于声音语（以别于书面语）的组成、结构、变化等内在特点与两种或多种声音语之间的对比等等一系列新的课题。过去谈

翻译，无论探讨理论或品评实践，都是以书面语为对象，现在出现了声音语这一广大的新天地，在时间（短促，不容拖延）、环境（国际会议之类）、人际关系（面对面或隔窗可见，而且多数是外国上层人士）等等也出现了必须考虑的新因素，看来翻译研究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而目前还只有零零落落的几篇综述文章。

* * *

有的课题，虽已有若干研究，但还需深入，还需“追踪”。例如科技翻译研究，别的不说，机器翻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就有必要弄清。最近报上登载军事科学院已经做出了“科译1号”翻译系统，就是一个值得追踪的重要消息。诗歌翻译研究论文不少，但似缺乏对一个重要译者的集中研究，也不能只停顿在若干字句的对比，而要引出几条重要结论；这类研究要提高，还需利用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新的研究成果，特别需要结合对汉语和中国诗歌的特点来深入探讨。

总之，翻译研究的前途无限。它最为实际，可以直接为物质与精神的建设服务，而且翻译的方面多，实践量大，有无穷尽的研究材料。它又最有理论发展前途：它天生是比较的，跨语言、跨学科的，它必须联系文化、社会、历史来进行，背后有历代翻译家的经验组成的深厚传统，前面有一个活跃而多彩的现实世界在不断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却永远需要翻译，并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新的课题。

词义、文体、翻译

近年来有两个方面的发展，值得引起翻译界的注意。

一是翻译的规模越来越大，质量也显著提高，而且这是中外皆然，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二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见解，可能会对讨论翻译问题有点帮助。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对第二点简略地说些粗浅的看法。

一

翻译者必须了解原作的意义，然而确定意义却大为不易。通过词义学的研究，人们可以看出：

1. 词义不是简单地一查词典就得，而是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上下文里。试看下面几例：

Out in the west where men are men.

Do you mean funny peculiar, or funny ha ha?

He helped many young writers to find themselves
and then to find publishers.

上面两个 men，两个 funny，两个 to find + object 都是

意义不同的，而其不同正是靠上下文来体现的，并且正因同一词在一句中有两义，才使这所说的话显得有点风趣。无怪乎颇有影响的英国哲学家 Wittgenstein 说：“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 in the language.”¹ 向来强调上下文 (context) 重要的现代英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 Firth 则更进一步说：“Each word when used in a new context is a new word.”²

上下文的重要，凡是翻译者都是深有体会的。但是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上下文不只是语言问题。说话是一种社会行为，上下文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社会场合或情境，正是它决定了词义。上面第一例如果没有 out in the west，亦即没有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大批白人涌向西部的历史大背景、大情境，那就无从确定第二个 men 是指的那些能骑马打枪的“男子汉”了。可见对翻译者以及一切学习和运用外语的人来说，如果要确实了解英语词义，就必须同时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情况。

2. 词义与用词者的意图不可分。换言之，不能只看语言形式。试举几例：

Have a drink.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I wondered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the luggage.

第一句不是命令，第二句不是问题，第三句不是过去时态

1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1953), p. 20.

2 “Modes of Meaning,” *Essays and Studies* (London, 1951), p. 118.

(说 wondered 只是比 wonder 更客气)——超过任何语法形式的重要性的是说话者的含义,即他的意图。所以语言学家 H. P. Grice 说:“Meaning means intention.”¹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在表达说话者意图的时候,有各种语言形式来传达细微的差别:

Come for dinner tomorrow. / 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tomorrow?

Take up his offer. / I should take up his offer.

Pass me the salt. / Would you pass me the salt? / I
would like a little salt, please.

这上面每一组句子都是表达同样的意图,然而其中各句语言形式不同,口气不同,可以看得出说话人与对方的社会关系也不同:有的话直截了当,显然是在自己家里对亲人或熟朋友说的;有的则更礼貌、更正式,像是说话人在别处做客。这一点,又使我们再度认识到前面所说的社会场合或情境对于语言运用的无比重要。显然,翻译者也应该在译文里传达说话人的意图以及他表示意图时在口气和态度等等方面的细微差别。

3. 意义是复杂的。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词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一句话不只是其中单词意义的简单的综合,它的结构、语音、

1 转引自 Peter Newmark, “The theory and craft of translati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s: Abstracts*, No. 1 (Cambridge, 1976)。

语调、节奏、速度也都产生意义。一词一句的意义有时不是从本身看得清楚的，而要通过整段整篇，亦即通过这个词或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下的多次再现才能确定。莎士比亚在《奥瑟罗》一剧里让主人公一再称伊阿古为 honest，这个 honest 一词就随着剧情的开展出现了讽刺性的意义，既讽刺这词对于伊阿古的邪恶性格的完全不适合，从而产生了反义，又讽刺主人公对坏人的轻信，结果造成了杀妻的悲剧。同样，当莎士比亚让安东尼在凯撒尸体之前对群众发表演说，几次郑重其事地指出：

For Brutus is an honourable man;
So are they all, all honourable men.

群众很快就听出这 honourable man 一语是另有含义的，而 all 两次紧接出现，又使他们意识到勃鲁特斯并不比其余的暗杀者好多少，最后他们终于在安东尼的巧妙的煽动之下，反过来打击那批刺杀凯撒的“正人君子”了。

不只是这类重复造成意义的复杂，有时还有故意留下半句不说的现象，这也对译者构成了困难。这在成语、格言、典故的运用上是常见的，例如只说 fool's bolt（说全应是 A fool's bolt is soon shot），still waters（Still waters run deep），snows of yesteryear（But 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ryear?），plus ça change（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虽是法语成语，在英语中也常有人说的），等等。最近读美国现代诗，又看见 Robert Bly 的诗中有这样一行：

And Wilson, saying, "What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这个 Wilson 是曾在 1953—1957 年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 Charles Erwin Wilson，他原是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当人们质问他为什么把几十亿美元的国防订货合同给了通用汽车公司时，他作了一个不失其生意人本色的绝妙回答："What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i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在这首诗里，作者把后半句略去了，然而美国人或留心当时美国情况的外国人是会懂得诗人的用意的。

但是这样的语言现象已不是词义学所能处理的了。词义学虽对翻译工作有点帮助，但范围有限。

二

现在我们来看看文体学又对翻译者有什么用处。

现代语言学家——以别于文艺学家——所研究的文体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有几个基本概念也许是可以应用于翻译的。

1. 语言要适合社会场合。一群科学工作者讨论专业问题时所说的话不同于他们回家后对妻子说的，成人与成人之间所用的词也不同于成人对儿童用的，闲谈的句子结构不同于作正式报告，写起文章来总比讲话要句子修整，段落分明，而同样是写文章，法律文书、外交条约、会议决议案、商业合同等等又迥然不同于日记、私人信件——如此等等，研究结果，出现了三个多少有点用处的概念：一曰“语

域”(register),即某一社会集团(例如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在特定社会场合(例如讨论本行业的技术问题)下所用的词汇、句子结构等等;二曰“语类”(varieties,如varieties of English),即科学、商业、体育、宗教之类的文体;三曰“共核”(common core),即各语类各文体都必须要用,而且在任何一类一体中都用得最多最广的基本词汇、基本句型种种。这最后一点很重要,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由于注意各类各体之异而忘了它们之间的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多于异的。从实际运用上讲,没有人能不掌握“共核”而独独能掌握某一语类或文体的;反过来,确实掌握了“共核”的人略经训练,要掌握某一特殊语类或文体却是并不困难的。

然而文学语言却构成了一个特殊问题。在文学语言中,不仅各类各体并存,而且作家们经常利用不同语类、文体的转换与对照来达到特殊艺术效果。而比这点更重要的则是:正是在文学语言中,“共核”的运用不仅最频繁,最活跃,而且达到了最能发挥其表达力的地步。

在翻译工作里,也必须注意语言与社会场合的关系。译文同样有一个适合社会场合的问题,同样必须能根据原文的要求,运用各种不同的语类、文体。例如翻译请帖、通知、布告、规章、病历与病情公告之类的“应用文体”,译者应该知道在译文里怎样寻到相等的内行的格式和说法。“油漆未干”必须译成英文的Wet paint,而不应是“The paint is not dry”之类的外行话。“此处有炸药,注意安全”照英语惯例大概应该译成:“DANGER: EXPLOSIVES”。换言之,在这些地方就不能照汉语字面直译,而必须要寻找适合于英